

振内需须应对 AI 世代 K 型经济

李健

2025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为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，来年的首要任务是提振消费、扩大国内需求。这是很有必要的：经济的供应方，有赖科技创新以增加产能，但假如消费不振，致需求不足，那便供过于求，形成通货收缩压力，需求便更弱，令 GDP（本地生产总值）持续低于产能。反之，一旦消费增加达致供求平衡，中国的 GDP 增长便可超越现时的范畴。

消费不振的首个成因：保障偏低

消费不振有三个主要原因，第一是社会保障偏低，社保的财政投入占 GDP 的比重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，只部份职工享有「五险一金」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低于每月 200 元，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享有的福利偏低。因此大多数人重储蓄不敢消费，有些人缺乏保障但又很少余钱储蓄。

消费不振的成因之二：收入趋低

第二个原因是劳动力的需求和价值下降。在农业和工业社会里，经济主要靠劳动力，但在后工业时代，随着科技进步，GDP 的各项生产要素中，科技、资本和企业行为的份额趋于增加，劳动力的份额则下降。在中国，工资增长放缓：从 2000-2009 年年均名义增长率超过 10%，下滑至最新 2024 年的 5.3%（实质增长率因有通缩而高些）。在人们努力拼搏下，失业率仍然受控。但「工资不好挣，工作不好找」，压力和不确定性大，一个现像是为谋生而家庭分离。

进入了人工智能（AI）和自动化年代，上述转变今后会加速。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（Elon Musk）近期预料，10 或 20 年之内，人们将不需工作。有 AI 教父之称的诺贝尔奖得主辛顿（Geoffrey Hinton）也看法相似，并担心广泛失业的后果。

因此，AI 世代的一个现象，套用一个美国近期流行的名词，是 K 型经济（K-shaped economy），指社会里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，那些技能和工资较低的工种，会逐渐被 AI 和自动化淘汰，相关工资可能渐趋于零，惟相应地会利好企业利润，少数人则收入特别高—例子是马斯克的万亿美元报酬。

但较高收入者只将其收入中的较小部份用来消费，故此，一边厢科技增加产能，一边厢消费需求趋于下降，形成供过于求。所以 AI 世代另一个趋势会是通缩压力持续。

一直以来，居民有两种自身收入：劳动收入，与财产性或投资收入。另外，对于自身收入较低的民众，政府提供援助性的「二次分配」，包括工资补贴，及实物补贴如保障房（公营房屋）。至于消费券和「旧换新」等政策性补贴，则是不问收入，人人可得。这些都不足以解决上述的保障偏低和收入趋低问题。

房产及股票等投资，在AI世代仍能裨益居民的财产性收入，然而不能弥补劳动性收入的萎缩。为了避免极度的贫穷和通缩，有必要将二次分配优化及系统化，让社会分配成为中低收入居民的第三个常态收入成份。

消费不振的成因之三：房价下跌

房产低潮尚未能决定性地见底。住房是居民最重要的财产和投资，目前有些地方房价离高峰已跌了超过一半，但全国住房的总量仍远超于住户总数。多年积蓄的财富缩水，令许多居民的消费意欲低迷。

「社会分配」办法

以下的简单机制，会同时纾解上述三个内需不振的成因，即借着政府发放「社会分配」（笔者之前发表的文章内称为「社会补贴」），俾居民的收入终其生都有保障，让消费达致与产能相匹配，同时为楼市注入大量购买力。

- 中低收入居民获国家发放「社会分配」，使之得享保障收入。
- 国家订出保障收入的上下限，全国划一，该两限各自为住户常居的县或市的中位住户收入的某个百分比。
- 下限是自身收入为零之住户所获发的社会分配额。
- 上限指当自身收入一旦增加达到该限，住户便不再获发社会分配，而开始须缴交收入税。
- 住户倘自身收入在该两限之间，按月获发社会分配，但分配额随着自身收入增加而递减。
- 每户所得的社会分配额，还视乎该户有多少人及其年龄组别。
- 取消保障房，现存保障房以市值出售或出租，或改作非住房用途或拆卸。

管理层可以按政策调整上述上限及下限，例如：将上限或下限上调，可扩大消费和内需，下调则减少消费和内需；如果增加两限之间的差距，可以加强居民工作的诱因；将上限订高些，可以让多些中产居民受惠。

引进社会分配安排还有那些方面利好经济？

就业人数、GDP及企业盈利都会增加，因为多了社会分配这项收入，职工所接受和企业所付出的工资有下降空间，加上可以免除企业在失业保险和退休保险方面的承担，形同减税。生产的成本低了，国际竞争力高了，产销和利润会增加，一些低端的产业会从不可为变得可为。而多了社会分配等同加了工资，待遇增加但压力减少，也有助增加就业人数。

而房屋补贴货币化，令全民都有能力买房，加上部份公租房廉租房等退出市场，将带动房市及相关行业，力度会比 2015-18 年棚户改造货币化时大很多。此外，优化了的收入保障将鼓励生育。

AI 世代人们还需要有收入吗？能有收入吗？

人的欲望和愿望是无限的，然而资源，例如土地、人力、时间、物资、能源、资本，却供应有限，因此有价值，但又是人们想要多些要好些的，须用其收入和财富来换取。

相信即使到了 AI 和自动化科技都充份发挥的年代，居民仍会有一定的工作机会，因为许多人会情愿与真人打交道；同时，人有些黃 Nvidia 行政总裁黃仁勋所说的 ideas，是 AI 未必能产生的。

政府补贴居民各种方法中，为什么以社会分配最能够增消费？

财政资源用作补贴或二次分配，有多少被受款的居民花出去，即措施是否高效，主要视乎受款者的边际消费倾向。这首先要看居民有多大安全感。其次要看受款者对补贴或分配有多大需要，自身收入较高的居民的需要会较低。此外也要看措施的性质：如果补贴或分配只是短期措施而非恒常安排，不增加安全感，也相对较为低效。

社会分配是恒常根据最新的居民收入数据，按收入低于保障水平多少，精准地满足所需。反观，一直以来不少补贴是不问需要的，又或者，特别在保障房方面，很多时只要申请时收入低于准入线，便长期获得同一水平的补贴，或一次获取庞大补贴。又有些情形是收入较高者获得较多补贴，因为买得起较昂贵的供选择实物（例如经济适用房）。可见，高效便是为财政节省资源。

政府征了税，用于社会分配等支出，受款人花出其中部份，多大部份则视乎上述的消费倾向；下游多次受款者又再花出去—即所谓乘数效应；每次花出去都增加 GDP，也就增加政府的税源。因此，高效益如上述的社会分配安排，是不会令政府「亏本」的。

社会分配安排还有 GDP 数字量度不到的效益：比起许多实物补贴，社会分配是发放货币，让居民自行购买自己最需要和最喜爱的，这便最大化其获得感。另外，居民知道自己的保障收入与全社会的收入同步上落，便对生活现状满意。

社会分配有什么财政来源？

保障收入须足够让居民自己去买或租商品房，看似要用多很多钱，其实废除保障房的一个意义，是将隐含在其内的补贴套现了，改以货币发给居民。同时，将存量公租房出售了，释出的资金，宜用来设立专项投资

基金，其回报用来恒常支付社会分配。另一个恒常财政来源，是原拟用作保障房的土地之将来出售所得。

实施社会分配即是改用「现收现付」（pay-as-you-go）模式来支付退休保障，那便不须关注日后社会保障基金会否出现入不敷支；现存社保基金的资产用途如何配合可以再探讨。此外，一个可以考虑加添的财政来源，是笔者之前文章内建议的土地升值税，因其税源是历年累积的土地升值，所以特别适合用于支付退休保障给越来越多的银发族。

社会分配会养懒人吗？

OpenAI 行政总裁阿特曼与特斯拉的马斯克都曾倡议在 AI 年代向人们派发「全民基本收入」（Universal Basic Income，或 Universal High Income）。近代曾有不少派发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，结果普遍显示领取了的人并不因而懒惰不思进取。

上述社会分配安排只是一个供普及、统一地提供收入保障的机制，保障之高低由管理层制订。从这条共同起跑在线，都仍是多劳多得。但会有更多人因而能安心发挥其创意与才能，这正是 AI 世代经济增长所需要的。而到了一个阶段很多人都没有工作机会或工作报酬不足以维生时，机制仍能为社会妥善分配经济成果。

优化社会保障还需要些什么？

与大多数经济活动不同的是，一些主要的保障性民生服务，如收入保障、医疗，和教育，主要由政府提供会比较高效，但以私营部门提供为辅也有必要。例如香港便有着成功行之已久的公营医疗体制。此外，上述社会分配安排只覆盖在职、失业和退休的基本收入保障，一些针对种种特殊需要的保障仍需由政府按既定准则另外提供。

AI 和自动化所造成的 K-型经济，在美国和在中国有什么不同？

在美国，对 AI 的巨额投资，支撑了经济，加上关税和严控外来人口等保护主业措施推高物价，所以目前没有通缩。K-型经济反映在失业率上升，从 2023 年的 3.2% 到 2025 年末的 4.4%，同时低收入者叫苦。由于美国「闭源 AI」的发展成本贵，其产能的增速或终不及中国。但中国反而在内需不振下感受通缩压力，经济增长低于潜能，打工仔不好过，所以早些实施社会分配安排的需要比美国大。

2026.2

barefootreports.net

[本文曾分上下篇发表于 2026 年 2 月 3 及 10 日香港《明报》。]